

《血砺忠诚》再现冀鲁边革命史

□张丽军 刘玄德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本质,在原始意义上便已经决定其所具备的历史记忆功能。在汤汤的历史长河中,翻涌前行的时间浪潮必定会裹挟着诸多的碎片,尤其是大量的历史细节,保留的只能是被无数次淘洗之后,并且仍在不断缩小的宏大历史的梗概。宏大的历史叙事像一面网眼疏阔的筛子,无数细小的事件和底层的人物,被过滤进时间的深渊。而文学对现实的干预和对历史的介入,是以艺术的方式完成对历史的再现。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在直面社会现实之外,不断注重对过往历史的关注,以文学的话语为载体,完成对历史的记载和补充。高艳国和赵方新的长篇报告文学《血砺忠诚》,便是对冀鲁边抗战历史的深入挖掘和艺术再现,使这段逐渐为人遗忘的悲壮历史,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价值。

为了确保作品中所涉及的时间、人物、故事情节、时代背景等各方面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作者以实地调查、大量查阅相关文献、采访当事者及其后代、搜集民间信息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相关资料,进行反复比对,提取客观真实的历史信息,确保作品对公共话语权利下集体记忆的呈现。作品中涉及大量的历史人物,其中冀鲁边区关键抗战人员包含萧华、刘格平、杜步舟、胡恒熙、张隐韬、马振华、高树勋、牟宜之、杨靖远、周贯五等数十人之多,囊括了冀鲁边区成立前后党内关键人物、民间抗战英雄、国民党积极抗日人员、反动分子、冀鲁边境内流匪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且人物生平和战争经历均真实可考。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作品中不仅关注抗战时期党内关键人物,更有对党内叛变者的记录和刻画。作者站在宏大的历史视角,敢于直面揭示革命内部存在的问题,客观地对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事件。而对党内反叛人员邢仁甫的真实记录,尤为可贵,大胆地涉及党内人员在抗战后期叛党反革命的事实,同时也揭示党内长期累积的矛盾。文章在书写邢仁甫成长、动摇及至叛变的过程,客观地写出了相关历史的变化,并且在逻辑之内展开合理想象,勾画出人物心理变化过程。作品从人物自身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等各方面综合分析,认为邢仁甫等人的叛变并非偶然,也并非单方面的过失。革命内部的隔阂、深厚的本土意识和帮派倾向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其最终的叛变。关于此次叛变事件,职位之

高、规模之大、危害之重,不仅在冀鲁边根据地,甚至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是难以想象的。在书写这一段历史时,作者进行大量的原始资料的查询,从诸多历史文献和当事人所著回忆录中提取信息,并且以实地调查的方式,从历史原点出发,收集当地重要信息。同时,对相关当事人及后代进行实地采访,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综合比对,确保事件的真实性、客观性。

此外,作品在叙述有关国民党的历史事件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行径,又对国民党内部积极抗日的行为做出正面评价。对国民党内的积极抗日人员,作者依然公正地站在历史一方。国民党委派的乐陵县长牟宜之,在担任县长的数年间,主动帮助共产党萧华部队,为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和日常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多次无视沈鸿烈和刘景良等人“积极反共”的指示,并提前透露刘景良企图偷袭共产党军队的机密。在与萧华共处的时间里,更加深了牟宜之对共产党的了解,并最终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此外,还有对国民党高树勋部的书写。由于冀鲁边共产党发展迅速,蒋介石派本地人高树勋率领军队前往,以求压制。高树勋对“消极抗日”的政策极为不满。萧华等人也正是看到这一点,便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为口号,努力联合高树勋共同抗日。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和战场上英勇的气概,令高树勋敬佩。而之后高树勋部遭遇日军围击,在生死存亡之际,共产党军队紧急支援,双方共同击退敌人,象征着国共合作下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此战之后,虽然高树勋继续担任国民党将领,并未显示出向共产党靠拢的迹象,但其对共产党的认识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记录着历史。可是,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福柯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各种论述来还原历史真相。德里达也认为“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每一种叙述都带有作者主体的历史观,这就使得单凭一人是无法呈现历史全部真相的,而只能抵达历史真相的某个侧面。虽然我们无法抵达全部的历史真相,但为了能够呈现出尽可能丰富的历史原貌,作者不仅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之上,完成了对宏观历史的续接,还以民间视角,大量融入个体的历史记忆和民间野史,从多方面实现对历史细节的修补和完善。

当下时代的现实问题,固然需要作家以敏锐的嗅觉去探索、呈现,但浴血的历史更需要我们缅怀,屈辱历史中由血肉铸就的民族精魂,更需要时刻铭记。报告文学具有正史所缺失、个人史所不及的独特的视角、视域和叙事品质,这一文体所建构的历史是无可替代的,或可说它可以弥补其他种种历史叙事的不足。在这一层面,《血砺忠诚》无疑为当代文坛中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血砺忠诚》
高艳国 赵方新 著
青岛出版社

《武则天传》
[日]原百代 著
天地出版社

宫斗之外的武则天 同样精彩

□王昱

如果考证一下宫斗剧源头,会发现其实最早的一批宫斗剧大多都描写了同一个主人公——武则天。想想也不奇怪,中国历史上后宫嫔妃虽然数不胜数,但真正凭借着美貌与智慧,一步步战胜对手,最终爬上皇帝高位的,也只有这一个女人。如此神乎其神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做到的?编剧们都在这段事迹上疯狂挥霍想象力,最终开创了情节曲折、机关算尽堪比侦探小说的宫斗文学。

然而放眼世界,你会发现女主临朝这事儿其实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比如近邻日本,历史上的女天皇多得不可胜数,从六世纪的飞鸟时代到八世纪的天平时代,八代天皇中竟然有六位是女天皇。按说这样的民族对于中国历史上独苗一根的武则天应该不稀罕,然而恰恰有这么一位日本女作家,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自学汉语、自查资料,写了一本文学性和历史性兼具的《武则天传》,此人就是已故日本女作家原百代。

脱去了幻想中的宫斗,千年前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在一个日本女性眼中究竟是怎样的呢?

作者几乎是以崇拜者的视角审视这位女皇帝的,在承认武则天缺点的同时,对武则天成就和能力极度肯定。在宫斗剧之外的传统中国历史叙述中,武则天几乎是以一个女暴君的形象载入史册,她大杀李唐宗室、鼓励告密制度,任用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晚年更是崇信面首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唯一值得称道的一点功绩似乎只有“上承贞观之治,下接开元盛世”——言外之意就是个给李家王朝看摊的,没把家业搞砸了是她的造化。

在《武则天传》这本小说中,武则天却完全不是这一形象,在必要使用暴力和恐怖之外,她励精图治、改革弊政,让国家做出了顺应时代的合理转型。而作者对于这些成就不吝重彩渲染和溢美之词。究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日本人的身份——日本虽然多有女天皇,但其皇位全部都由于其血缘所得,在位期间也几乎都是“称而不制”,将政权运作全部交给男性臣僚,个人少有作为。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武则天这样一个执政能力和执政欲望同样惊人的神奇女性实在太特别了。对其能力所从何来的解读的重要性,远胜过谴责其“牝鸡司晨”之类的说辞。也正是有赖于作者这种新奇感,我们得以在小说中看到了一个能力卓绝、励精图治的武则天。

相比于如今的宫斗剧着重于描写武则天与皇上以及后宫嫔妃们那点事,《武则天传》中的视角要宽广、宏大得多,武则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几乎都在作者的描述之列。比如在武则天步步夺权的紧张“上位”进程中,作者十分自然地宕开一笔,描述对东亚国际格局影响至深的中日首战——白江口之战。这样宽广的视野,恐怕是任何一部有关武则天的宫斗剧编剧想都想不到的。

在打开视野之后,读者们不难对武则天崛起的历史必然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与大多数描写武则天的作品将其成功归结为其个人手腕和狠辣心肠不同,这本小说看到了当时的历史大势——在初唐与盛唐之间,中国曾经经历过一个重大的转折:皇权的上升与以关陇贵族集团为代表的贵族势力的衰落。这个转折不是一蹴而就的,出身于关陇贵族的李唐皇室也不便于对跟自己沾亲带故的故旧下手。于是像武则天这样一个并非出身高门显贵又有着高超政治手腕、杀起人来毫不手软的毒辣皇后角色就成了“时代需求”,她本质上不过是皇上找来的一只“政治白手套”,至于这只白手套最终竟然差点反噬李唐皇室自身,则是历史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武则天传》就是这样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都化解在一个又一个故事中,并让这些故事环环相扣,最终编织出了武则天波澜壮阔的一生。

《武则天传》并非严谨的历史书,又非完全放飞想象的小说,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严谨又不乏文学色彩的历史小说。不过也许正是这样的小说,才能让读者更加容易地读下去,并明白:历史上真实的武则天生命中不只有宫斗,她的胸怀与故事比这宽广得多。

【出版消息】

摄影教程《影像·心悟》出版

近日,山东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吴思强及其研究生王冰、张成金编著的《影像·心悟:人文地理摄影创作方法实例》出版。在本书中,吴思强总结多年的摄影教育和创作经验,以实战案例形式,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人文地理摄影创作中主题构思、拍摄技法、后期处理、包装展示等全部流程及创作理念、社会价值思考。书中收录了300余张吴思强师生拍摄的摄影佳作,并配合文字解析将创作思路、拍摄经验、审美观念和人文地理知识融会贯通,打造出了这本涵盖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领域的精品摄影教程。

“不做历史的旁观者,做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是吴思强的座右铭,也是贯穿于此书的创作理念,他认为人文地理摄影特别要注重客观真实地用思想去关注社会文化现象、关注生态变化发展、关注人的生活状态,追求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体现。